

#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全球化與日本經濟衰退之政治經濟分析：從財政赤字及公共工程建設的角度觀察

Globalization and Japan's Recession: Consider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inancial Deficit and Public Construction

doi:10.30390/ISC.200401\_43(1).0003

問題與研究, 43(1), 2004

Issues & Studies, 43(1), 2004

作者/Author：蔡增家(Zheng-Jia Tsai)

頁數/Page：63-82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04/01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200401\\_43\(1\).0003](http://dx.doi.org/10.30390/ISC.200401_43(1).0003)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 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 全球化與日本經濟衰退之 政治經濟分析：從財政赤字及 公共工程建設的角度觀察

蔡 增 家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第二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 摘 要

過去分析日本經濟十年衰退的最主要原因，常歸咎於金融體系巨額的不良債權，忽略了日本日益高築的財政赤字，其實日本總財政赤字已經高達三百兆日圓，遠遠超過其國民生產總額，而日本政府這幾年以來總是陷在先救財政赤字亦或是先解決金融體系不良債權的兩難中，任何一個國家遭遇到這種局面，其經濟在短期之內是很難迴轉的。接下來我們的問題是：為何日本政府會累積這麼高的財政赤字呢？這些財政赤字絕大部分來自於地方公共工程建設，根據經濟學理論成本效益分析，一個政府若要進行一項公共工程建設，將會謹慎評估其使用效益，及在使用者付費的情況下來考量其回收成本的年限。但是日本的情況不然，在日本鄉間我們隨處可以看見寬敞的道路，但是卻沒有幾輛車經過，一座付費的隧道在費用高昂的情況下，一天沒有幾輛車通過。這些不必要的公共工程建設都是當地國會議員為了爭取選票而興建，因為一項公共工程建設的進行，不但可以讓當地選民明顯知道自己的政績，同時可以讓地方企業承包這項工程，這些地方企業在選舉時自然是其主要政治獻金的來源，因此這種公共工程的興建完全是基於政治上的考量而非經濟上的考量。因此日本戰後總理大臣絕大部分來自農業縣份，而每位總理在其任內都為其家鄉爭取幾項重大公共工程建設。本文將舉日本群馬縣安中榛名車站及長野縣田中康夫罷免事件為例，分析日本毫無效率的地方公共工程建設，並說明日本地方政治人物為了分食公共工程大餅所進行的政治角力。

關鍵詞：財政赤字、公共工程建設、政治獻金、金融體系、日本

\* \* \*



## 壹、前言

連接日本本州與四國之間的瀨戶內海上橫躺著三座跨海大橋，這三座跨海大橋在過橋費奇高的情況下，一天並沒有幾台車經過，而負責興建這三座跨海大橋的日本國家道路公園在當初規劃時，原本預計三十年回收成本，目前則預計回收時間約要五十年，並隨時有再延長的可能。為何在人口不到一千萬的四國島上要興建三座跨海大橋呢？原因在於大橋興建當時日本自民黨內派閥領袖前首相大平正方及三木武夫都是來自四國，其爲了自身選區利益究竟要將跨海大橋建在哪一縣而爭執不下，最後在派閥權力恐怖平衡下，便在大平的愛媛縣、福田的德島縣各建一座大橋，而竟連出身於岡山縣的宮澤喜一也爭取到一座大橋。在日本這種因爲政治因素所興建的地方公共工程比比皆是，尤其是擔任日本總理大臣者，更是要爲自己家鄉謀求更多的福利與建設，最有名的當屬田中角榮在擔任首相時所喊出的「列島改造計畫」，他將新幹線延伸到其選區，鄰近日本海人口不到五十萬的新瀉縣。

再將場景拉回至現今的日本。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於二〇〇二年十月到北韓進行「破冰之旅」，並成功帶回二十五年前被北韓間諜綁架的十三名日本人的訊息，這項舉動讓小泉的民間聲望頓時提高百分之十（從40%提高至50%），而小泉也順勢利用民間高漲的民意支持度，對內閣進行強勢改組，但是日本股票市場卻是極不給舉著「構造改革」大旗的小泉面子，因爲日本東京證券市場於十月七日攪破九千點大關，降至八千五百三十九點，是自從泡沫經濟以來的最低點。<sup>①</sup>日本經濟已經低迷了十三年，問題究竟是出在哪裡？爲何在這十三年間，日本歷經九位首相仍然無法挽救日本經濟？他們的政策出現何種錯誤？這是本文首先要探討的問題；第二個問題是，爲何在全球化之前，日本經濟能夠穩定成長，並安然度過兩次石油危機，但同樣的政策在全球化之後無法奏效？換句話說，全球化對日本政府的經濟治理能力產生何種影響？

日本目前所面臨的經濟問題其實可以從兩個面向來分析，首先是財政赤字的問題。日本政府從一九七一年開始發行國債來進行公共建設，這原本向來是許多國家因爲政府資金不足而向民間籌措資金的一項政策，但是日本公共建設在派閥選區本位主義下，卻是極度沒有效率的。例如，先前所提連接日本本州與四國之間的跨海大橋興建案，最後竟在派閥權力平衡而不顧成本效率的情況下興建三座。這種無效率的公共工程建設，讓政府負擔鉅額的財政赤字，預計目前日本財政赤字已經爲累積超過一年全國國民生產總額。<sup>②</sup>

另外一項問題是銀行體系的不良債權。在一九八六年日本因爲「廣場協議」（Plaza Accord），日圓急遽升值及日本銀行利率政策的失控，造成日本前所未有泡沫經濟

註① 讀實新聞，2002年10月8日，版1。

註② 伊藤正直，「1990年代の金融システム危機」，伊藤正直、淺井良夫編，金融危機と革新：歴史から現代へ（東京：日本經濟評論社，2000年），頁406~407。

的榮景，日本泡沫經濟主要來自於房地產及證券市場價值的飆升，在一九九一年泡沫經濟的最高峰，光東京都一地土地的價值便可以買下整個美國的土地，而日經指數更從不到一萬點一路竄升至近四萬點，在日本人民誤認土地及股票市場將會無止盡上升的預期心理下，便將現有的價值不菲土地及股票向銀行質押借得大筆金錢再投入土地及股市當中，這樣持續循環造成日本人民累積許多虛擬的財富，結果在一九九一年日本銀行緊縮銀根政策下，日本過熱的經濟開始冷卻，房地產價值及股市指數一路下滑，經過十年的不景氣，日本經濟及日本人財富又重新回到泡沫經濟前的標準，但是日本銀行體系卻因為泡沫經濟時對房地產及股票價值的過分高估而累積大量的不良債權，預計現今日本銀行不良債權已經超過十兆日圓。<sup>③</sup>

由此可見，財政赤字與銀行不良債權是小泉政府目前面臨最大的經濟困境，在現今有關日本經濟的探討當中，關於銀行不良債權的文獻較多，而對於財政赤字的問題則關注較少，因此，本文嘗試從財政問題的角度切入，分析日本經濟衰退的主要原因。本文區分成五個部分：首先是理論的探討，主要分析全球化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也就是自由化之後對政府政策會產生何種結構性的改變；其次是從歷史的角度探討日本財政赤字產生的背景因素，並分析政治派閥、地方世家及樁腳企業在公共建設當中扮演的角色；第三部份則是分析全球化之後日本政府治理能力的衰退，並以群馬縣安中榛名車站及長野縣田中康夫罷免案等兩個例證來說明日本公共建設的無效率性及改革遭受到的阻礙；第四部份則結合理論架構分析日本財政赤字對目前日本經濟的衝擊與影響，及其最適當的解決之道；最後則是根據以上四節的分析作簡單的結論。

## 貳、理論探討：全球化、財政政策與經濟發展

過去，東亞國家大多是以政府為主導，營造一個封閉的經濟體制來發展經濟，這種發展國家模式成功地塑造日本、南韓及台灣在一九六〇年代及一九七〇年代的經濟快速發展奇蹟。<sup>④</sup>但是到了一九九〇年代之後，在全球化及自由化的衝擊下，日本、南韓與台灣的經濟卻不約而同停滯下來。過去十年當中，許多文獻紛紛探討自由化之後，東亞國家政府對國內經濟控制力的減弱是造成其經濟衰退的最主要原因，換句話說，發展國家模式在全球化市場開放之後已經不太能夠適應在東亞國家的經濟發展體制。<sup>⑤</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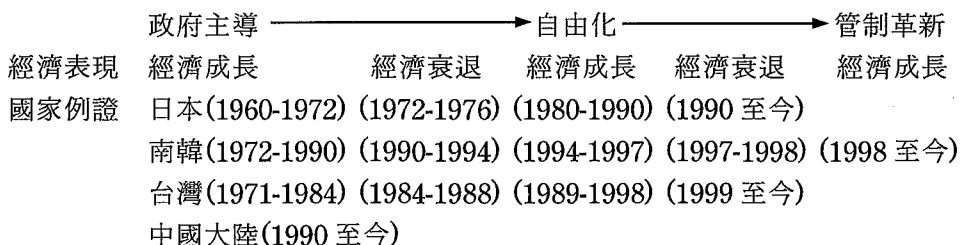
註③ Hiroshi Yoshikawa, *Japan's Lost Decade* (Tokyo: International House of Japan, 2001), p. 58.

註④ 有關日本、台灣及南韓在一九七〇年代的經濟發展，請參閱 Chalmers Johnson,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 1925-1975*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Robert Wade, *Governing the Market: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 Industrializati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Alice Amsden, *Asia's Next Giant: South Korea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註⑤ 蔡增家，「資本管制與金融自由化：以日本為例」，*問題與研究*（台北），第38卷第3期（民國88年3月），頁71~72。

如果將觀察範圍及時間點擴大，我們可以將二次大戰之後東亞國家的經濟發展區分成政府主導、自由化及管制革新（再管制）三個時期，每個時期都會歷經經濟成長與經濟衰退兩個不同的階段。<sup>⑥</sup>以日本為例，從一九六〇年至一九七二年為政府主導的經濟高度成長時期，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六年進入經濟衰退期，之後從一九八〇年開始進行自由化，讓日本進入從一九八〇至一九九〇年自由化的經濟成長期，一九九〇年之後日本又進入經濟衰退期，至今經濟仍然沒有復甦的景象。最重要的原因是，日本政府仍然承襲過去以擴大政府公共工程支出來刺激景氣的經濟政策，並未對已經自由化的產業進行再管制，這也就是目前南韓經濟能夠從一九九七年金融風暴的陰影走出，而日本經濟卻仍然持續疲軟的最主要原因（圖一）。<sup>⑦</sup>

圖一 政府管制、自由化與管制革新



其實從一九九〇年代東亞國家陷入經濟不景氣之後，我們發現這些國家的國內經濟政策具有一項非常重要的特徵：這些國家都採取擴大政府公共工程支出來刺激景氣的政策。例如日本從一九九二年至一九九六年期間施行六次的刺激經濟景氣對策，南韓金大中也在一九九八年至二〇〇〇年期間施行擴大政府公共支出政策，台灣也在二〇〇三年宣佈五百億政府公共工程支出政策。<sup>⑧</sup>而日本在一九七一年第一次石油危機時期，同樣曾經施行擴大政府支出政策，在當時達到經濟成長的效果，但是現今雖然投注一百七十六兆日圓卻無法達到經濟復甦的效果，這種情況不得不讓我們必須要進一步思索在全球化體制下，擴大政府支出與經濟成長之間的關係。<sup>⑨</sup>

註⑥ 有關本論點請參閱蔡增家，「東亞市場經濟的深化與矛盾」，頁910，本文已發表於日本東京第三十屆中國大陸與日本研討會，民國92年3月27日；蔡增家，「東亞市場經濟の深化與矛盾」，問題と研究（日文版），第32卷第7號（2003年4月），頁59～71。

註⑦ 有關管制革新議題，請參閱Steven Vogel, *Freer Market, More Rules: Regulatory Reform in Advanced Industrial Countries*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6～24；劉孔中，施俊吉主編，管制與革新（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科所專書（50），民國91年4月），頁283～327。

註⑧ 中國時報，民國92年，2月20日，版2。

註⑨ 土居丈朗，「バブル形成、崩壊期の国債發行」，村山岐夫、奥野正寬編，平成バブルの研究：バブルの発生とその背景構造（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2002年），頁370～371。



擴大政府公共工程支出最主要的意涵是，政府利用提撥特別預算或是舉債的方式來增加公共工程建設，例如道路修築或是修建新的鐵路，希望透過政府建設的方式來吸引企業的投資。<sup>⑩</sup>而在這種政府與市場關係下，以全球化的角度來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民意代表之間便會出現截然不同的互動關係。在全球化之前，政府主導經濟的能力相當強，而國會等民意機構的能力相對降低，因此政府可以營造一個封閉的經濟體制來加強對國內經濟的治理，以快速達到其政策目標，因此，此時政府若採取公共工程支出的政策，可以全盤掌控預算的分配與執行。<sup>⑪</sup>

但是在全球化之後政經體制逐漸鬆綁，國會的能力增強，此時若採取擴大公共工程支出政策，政治力量容易介入，將預算變成政治分贓，形成大量無效率的公共工程建設。例如，政府發佈一項公共工程支出方案，必定會引起許多地方政府爭取這筆預算，並且透過國會議員施壓將這項公共工程建設列為其主要政績，而使得政府這項擴大公共工程支出無法利用在真正需要的地方，這種情況在全球化之前由於政府主導的力量相當強使得國會議員的力量尚致無法介入，但是在全球化之後，國會的力量逐漸強大，使得政府控制預算執行的能力越來越弱，導致由地方世家及政治派閥掌控政府公共工程的預算。例如，日本在全球化之前，公共工程建設幾乎都是全國性，全球化之後轉變為地方性，而且是由政治派閥、地方世家及企業三個行為者來控制政府公共工程預算。<sup>⑫</sup>

以圖二為例，我們可以將全球化前後分成大小兩個三角形，在小三角形是全球化之前的主要行為者：官僚、國會與企業，在此時官僚主導經濟的發展，並能夠控制國會與企業，官僚體系與政黨相互結合來控制國會，同時官僚體系也透過掌控銀行體系來控制企業的資金來源，因此，官僚體系便可利用擴大政府公共工程支出來刺激經濟的發展；但是全球化之後，主要行為者從官僚轉變為政治派閥，國會轉變為地方世家，而企業變為企業樁腳，若此時政府以擴大政府公共工程支出來發展經濟，則便由政治派閥以選區政治利益思考來分配工程補助款，因此，政府補助款便會因為地方世家穩固選區的理由而發包給企業樁腳，因此政府擴大公共工程支出便難以達到經濟成長的效果。<sup>⑬</sup>在了解全球化、財政政策與經濟發展之間的互動關係之後，接下來便要探討

註⑩ 蔡增家，「論資本自由化與總體經濟政策的調整：以日本及法國等干預型國家為例」，美歐季刊，第14卷第2期（民國89年夏季號），頁230~2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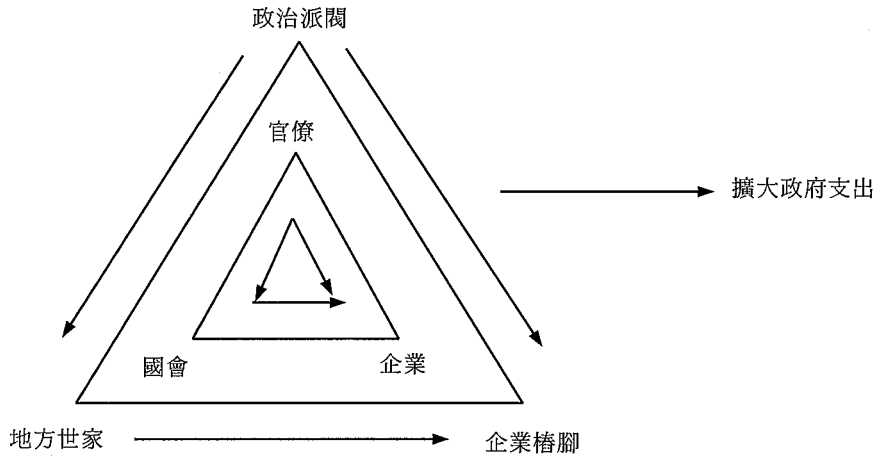
註⑪ 有關財政政策與經濟成長之間的理論學理探討請參閱 Alfred Greiner, *Fiscal Policy and Economic Growth* (Aldershot, Hants, England: Brookfield, 1996); Augusto Lopez-Claros, *Fiscal Policy Issues During the Transition in Russia*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1998); Gisli Blondal, *Fiscal Policy in the Smaller Industrial Countries, 1972-82*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1986); Mario Monti, *Fiscal Policy, Economic Adjustment, and Financial Markets*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1989); John Creedy, *Fiscal Policy and Social Welfare: An Analysis of Alternative Tax and Transfer Systems* (Cheltenham, U.K., 1996)。

註⑫ 蔡增家，「九〇年代日本派閥政治之分析」，問題與研究，第41卷第3期（民國81年5、6月），頁69~70。

註⑬ 同前註，頁70~71。

日本從一九七〇年之後財政政策下政治派閥、地方世家及企業樁腳之間互動關係的轉變。

圖二 全球化、財政政策與經濟成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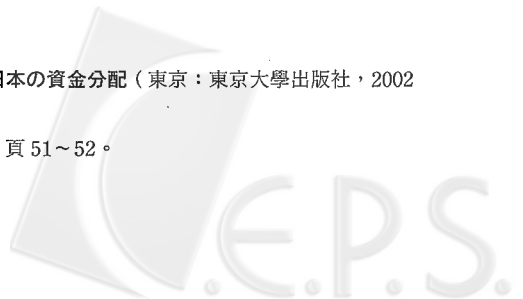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 叁、戰後日本財政政策的實施： 派閥、地方世家與企業

日本從一九六〇年開始全力發展經濟，其策略是，在政治上以官僚為主導，在經濟上以主要銀行體系為後盾，營造一個封閉的經濟體系；這種策略讓日本經濟進入戰後的高度成長期。一九六五年日本歷經戰後第一次的經濟不況，在稅收短少的情況下，佐藤榮作首相在當年便發行兩千五百九十億日圓的國債，這是日本在二次戰後第一次發行國債，之後便開始進入日本所謂國債發行期。<sup>⑭</sup>一九七五年歷經石油危機之後，三木武夫內閣發表「財政危機宣言」，宣佈成立赤字國債特別法，發行兩兆兩千九百億日圓的國債，日本正式進入赤字國債時期，之後日本政府的國債發行量便每年急遽攀升。舉例來說，一九七七年日本國債發行額高達九兆五千六百一十二億日圓，其中赤字國債佔四兆五千三百三十三億日圓，國債佔歲入依存度的百分之三十二點九。<sup>⑮</sup>這些國債全部都運用在公共工程的建設，換句話說，日本政府是在國債赤字額逐漸升高的情況下以財政政策來刺激經濟的成長。大平正芳首相在一九七九年想要導入徵收消費稅來降低財政赤字危機，結果遭到來自自民黨內的強烈反對，緊接著自民黨在該

註⑭ 岡崎哲二、奧野正寬、植田和男、石井晉、堀宣昭，戰後日本の資金分配（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176。

註⑮ 小次木潔，財政構造改革（東京：岩波書局，1998年），頁51~52。



年衆議院選舉中慘敗，大平對於一般消費稅導入的建議自然無疾而終。<sup>⑮</sup>在另一方面，面對一九七〇年代的兩次石油危機，日本政府開始以擴大政府公共工程建設來復甦經濟，因此從一九七〇年開始發行建設公債，當時主要的建設是以全國性的道路工程建設（新幹線及環島高速公路）為主體，例如田中角榮首相所提出的列島改造計劃等。<sup>⑯</sup>當時這些公共建設都是由中央政府所主導，地方政府則是扮演政策配合的角色，這與一九九〇年代的地方補助款形式是相當不同的，而這些全國性的基礎公共建設對日本經濟能夠度過兩次石油危機具有相當大的助益。

一九八〇年鈴木善幸首相任內，由當時經團連會長土光敏夫在政府第二次行政調查委員會中提出「土光臨調」的財政建議，在這項方針下土光希望日本政府能以增稅及財政再建為今後施政的基本方針，同時冀望能夠逐步降低政府對國債依存度的比例。<sup>⑰</sup>但是在當時的內外政經環境下，以擴大政府公共工程支出的確是最有效能夠提昇日本經濟的藥方，日本政府的國債發行量便日漸增加而不見縮減，土光的財政建議未被日本政府接受。根據統計，日本國債的發行量在一九八〇年代，從一百零九兆跳增至兩百零六兆，在十年間整整增加兩倍，建設公債也從十六兆擴增至七十五兆，總共增加五倍之多。<sup>⑱</sup>接下來日本歷經一九八〇年代泡沫經濟的榮景，直到一九九〇年泡沫經濟破滅，日本經濟成長才又再度停頓下來。

一九九〇年日本泡沫經濟破滅之後，為了有效提昇日本經濟，從宮澤喜一首相開始，又想利用一九七〇年代讓日本脫離兩次石油危機的擴大政府公共工程支出的經濟政策，因此從一九九二年至一九九六年期間，日本政府投注六十六兆日圓，進行六次的刺激經濟景氣對策。<sup>⑲</sup>但是一九九〇年代的經濟對策與一九七〇年代擴大政府支出的性質具有相當大的不同，舉例來說，一九七〇年代日本政府的公共工程，大多集中在全國性的道路建設，但是一九九〇年代卻是集中在地方性的公共建設；在另一方面，一九七〇年代的公共工程經費是由中央建設省統一發包執行，但是一九九〇年代卻是由中央政府提撥地方補助款給予地方政府來執行。因此從數據上看，從一九九〇至一九九七年期間，日本建設國債的發行量從七十五兆日圓大幅提昇至一百七十二兆日圓，但是在執行效率及提昇經濟的政策效果上卻是遠不如七〇年代的經濟政策。<sup>⑳</sup>

本文不禁要問：為何同樣是擴大政府公共建設支出政策，在一九七〇年代與一九九〇年代卻出現截然不同的政策效果？本文認為最主要的原因在於日本政經體制從一九八〇年之後便產生相當大的轉變，由原本政高黨低的型態轉變為黨高政低的模式，換句話說，政府政策的主導權逐漸由官僚體系轉換為自民黨派閥，所以在一九九二年

註⑮ 富田俊基，*日本國債の研究*（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2001年），頁45。

註⑯ 蔡增家，「垂直—整合與脆弱—衝突：論九〇年代日本金融政治的轉變」，*問題與研究*，第39卷第2期（民國89年2月），頁47~48

註⑰ 小次木潔，前揭書，頁52。

註⑱ 土居丈朗，前引文，頁367~369。

註⑲ 伊藤正直，前引文，頁414~415。

註⑳ 眞淵勝，「財政政策の成功と金融政策の失敗」，村山岐夫、奥野正寬編，*平成バブルの研究*，頁1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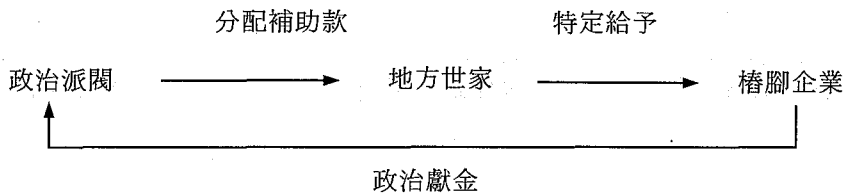


之後，六次擴大政府公共工程支出的經費便全部由政治派閥所主導，再加上是地方小型公共工程建設，因此便以地方補助款型態由派閥掌控操作分配給地方政府；因此，政府公共建設由經濟需求轉變為政治的考量。在這種形式下，一項公共建設的興建並非由經濟效率及成本角度來考量，而完全是由選區利益及選票多寡為其主要考量。<sup>②</sup>

另一方面，由於日本公共建設經費的分配大多掌控在派閥的手中，而自民黨派閥大多出身於農業縣，在野黨議員則是出身於都會選區，因此在公共建設經費上的分配，農業縣份明顯高於都會縣市。以表一為例，從一九九四年至一九九八年期間，平均每人所能分配到建設經費最高的縣份都是在靠日本海的島根縣，在一九九八年每人平均為八十一萬一千兩百五十七日圓，同時島根縣也是自民黨竹下派掌門人竹下登的故鄉，而每人平均分配到經費最少的縣份則都是集中東京都周圍的千葉縣、神奈川縣及埼玉縣，每人平均只有二十三萬日圓左右，為島根縣的四分之一。<sup>③</sup>

在實際政治運作上，日本政府利用發行建設公債將擴大公共工程經費提撥在地方補助款當中，而這些地方補助款由派閥來加以分配到各個縣市，因此，來自農業縣份的政治派閥在其選區當中便會得到較多的補助款，派閥可以利用這些工程補助款來分配給其旗下的縣市議員，再由這些議員轉包給樁腳企業或是個人經營的企業，以達到鞏固選票的目的。在選舉的時候，這些企業便成為派閥在地方最重要的樁腳，並提供巨額的政治獻金，政府公共工程建設便成為政治人物鞏固選票的最主要手段（請參閱圖三）。

圖三 派閥、地方世家與企業關係圖



因此，我們發現在日本政治運作當中，政府公共工程支出的分配完全是依照政治的考量，而非由經濟為出發點，因此，在日本鄉間舉目都可以看到一些閒置而無效率的公共工程建設，舉例來說，在日本群馬縣的最近最大的爭議便是應否在吾妻河上興建吾妻水庫。在群馬縣出身眾議員小淵優子（前首相小淵惠三的女兒）的積極爭取下，日本政府準備在吾妻河上興建一座水庫，但是水庫上游已經有一座水庫，因此，吾妻水庫興建的必要性便成為相當爭議的問題，但是在地方議員的壓力下日本政府仍然決定繼續興建水庫，因為這些公共工程的支出是其最主要的經濟來源。<sup>④</sup>由此可見，

註② 秋月謙吾，「地域金融機關と地方政府」，村山岐夫、奧野正寬編，平成バブルの研究，頁182～183。

註③ 「行政投資實績」（東京：自治省出版），1996年至2000年。

註④ 有關本段敘述係實地訪談日本群馬縣眾議員小淵優子秘書田中邦雄，二〇〇二年七月十四日。

許多日本公共工程建設完全以政治為考量，而非適合實際的需求。接下來分別從政治與經濟兩個不同的層面來分析全球化對政府治理能力的影響。

表一 日本公共建設分配表

單位：日圓

| 年份   | 上位縣 | 建設經費※  | 建設經費排名 | 下位縣  | 建設經費   | 建設經費排名 |
|------|-----|--------|--------|------|--------|--------|
| 1994 | 島根縣 | 639620 | 第一位    | 桓木縣  | 302217 | 第一位    |
|      | 島取縣 | 601646 | 第二位    | 福岡縣  | 299012 | 第二位    |
|      | 高知縣 | 579475 | 第三位    | 埼玉縣  | 252769 | 第三位    |
| 1995 | 島根縣 | 637873 | 第一位    | 千葉縣  | 287280 | 第一位    |
|      | 長野縣 | 617837 | 第二位    | 神奈川縣 | 280938 | 第二位    |
|      | 高知縣 | 615851 | 第三位    | 埼玉縣  | 247449 | 第三位    |
| 1996 | 島根縣 | 664624 | 第一位    | 神奈川縣 | 262884 | 第一位    |
|      | 兵庫縣 | 615492 | 第二位    | 千葉縣  | 257072 | 第二位    |
|      | 高知縣 | 610279 | 第三位    | 埼玉縣  | 236224 | 第三位    |
| 1997 | 島根縣 | 691075 | 第一位    | 千葉縣  | 245356 | 第一位    |
|      | 島取縣 | 609752 | 第二位    | 神奈川縣 | 237046 | 第二位    |
|      | 德島縣 | 599741 | 第三位    | 埼玉縣  | 225911 | 第三位    |
| 1998 | 島根縣 | 811257 | 第一位    | 千葉縣  | 235981 | 第一位    |
|      | 德島縣 | 662140 | 第二位    | 埼玉縣  | 234796 | 第二位    |
|      | 島取縣 | 640535 | 第三位    | 神奈川縣 | 224173 | 第三位    |

※算出方法：行政投資總額除以人口數

資料來源：「行政投資實績」，東京：自治省出版，1996年至2000年。

## 肆、全球化、財政政策與政府治理能力

由上一節對日本從二次戰後以來經濟政策的分析，我們發現一九八〇年代之後全球化與自由化的確對日本經濟政策的效果產生相當大的影響，其最主要的原因便在於全球化之後日本政府治理能力降低了。以下討論治理能力降低究竟會產生何種政治經濟影響，並舉出日本的實例來加以印證。

### 一、全球化之後日本政府治理能力的降低

從二次大戰之後財政政策是許多發展中國家被普遍使用的的一項經濟政策。它主張以擴大政府支出來刺激景氣，而政府擴大財政支出、興建許多公共建設，可以有效提昇就業率，達到穩固政權的目的，這也是許多政府使用財政政策的原因之一。<sup>⑤</sup>根據經濟學者 Marcus Fleming 的理論，在封閉型經濟體系當中，實施財政政策效果是

註⑤ 蔡增家，「論資本自由化與總體經濟政策的調整：以日本及法國等干預型國家為例」，頁 234。

可以預見的，而貨幣政策則是比較沒有效用的；反之在開放型經濟體系當中，實施貨幣政策比較有效，而財政政策則是比較無效的。<sup>②⑥</sup>因此當全球化開放資本自由流動將國家的經濟體制從封閉型經濟體轉變為開放型經濟體，將會使政府的財政政策失去效用；財政政策失效的最主要原因便是國外資金大量進入及政府放鬆對國內資本的管制，使得企業不再以銀行體系為其主要的資金來源，因此當政府擴大公共支出，在經濟上，廠商並不會將利潤使用在生產工具上，同時也可以將利潤所得匯到國外進行再投資。

全球化之後造成政府治理能力的降低會在政治與經濟兩個層面產生影響。在政治上則是持續自民黨保守政權的穩定，自民黨開始經營地方團體乃源自於一九五五年體制成立之後，它在全國各地成立後援會以利於選舉時的動員，當時農業縣份透過人際網絡的動員力量最為成功，使得農業縣成為自民黨的大票倉，而自民黨也一直以農業保護政策來維持農民的利益。<sup>②⑦</sup>到了一九七〇年代，在日本政治體制中出現地方補助款，當時日本首相田中角榮正在進行所謂的「列島改造計畫」，以進一步拉近都市與鄉鎮之間的發展差距，因此便給予選區在鄉下及偏遠地區的議員一定數額的地方建設經費，由地方議員依據所需發放，這稱之為地方補助款。<sup>②⑧</sup>到了八〇年代末期，地方補助款逐漸成為議員綁樁的籌碼，也成為議員回饋地方支持的最主要來源。根據調查，在歷年來對於自民黨的政治支持率當中，農民團體通常高出全國平均支持率的15%，對於自民黨的支持率更高於社會黨達40%以上。<sup>②⑨</sup>

在經濟上則是維持日本金權政治的特性。政治獻金一直是日本政治人物及政黨最主要的資金來源，長久以來日本財閥便在選舉中為特定的派閥給予大筆的政治獻金，使其當選之後能夠為特定利益的法案護航，而日本派閥領袖最主要的判定標準之一就是他在企業界的人脈及募款能力。例如，一九七〇年代在自民黨內呼風喚雨的田中角榮，便是金權政治最有名的例證。而大財團對特定政治人物給予鉅額的政治獻金，也使得八〇年代日本政壇出現許多政治醜聞，最有名的當是瑞克魯特案及洛克希德案。<sup>③〇</sup>二〇〇〇年初小淵惠三內閣通過政治獻金法案，但也僅限於對政黨的限制，對於個人的政治捐獻目前仍無法約束。以表六為例，在泡沫經濟時代自民黨五大派閥中，竹下派的政治資金約有八億至十億日圓之間，安倍派最高達二十七億日圓，宮澤派也

註②⑥ Marcus J. Fleming, "Domestic Financial Policies under Fixed and Floating Exchange Rates," *IMF Staff Paper 9*, (1963), pp. 369~379.

註②⑦ 辻中豐，*利益團體*（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頁108。

註②⑧ 小林吉弥，*越山會*（新瀉日報社，1987年），頁195。

註②⑨ 從二次世界大戰以降，農業便是日本政府最為保護的產業，而五五體制之後自民黨的長期執政使得農民成為自民黨的最主要支持者，自民黨的主要票倉，因此自民黨更為保護農業使得日本的稻米價格長久居高不下，在這種政策下，以農民團體為主導的組織便開始在選舉當中為自民黨的候選人募款，而農業信用合作社也成為自民黨政策運用的主要基金來源。樋渡展洋，*戰後日本の市場と政治*（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5月），頁161~1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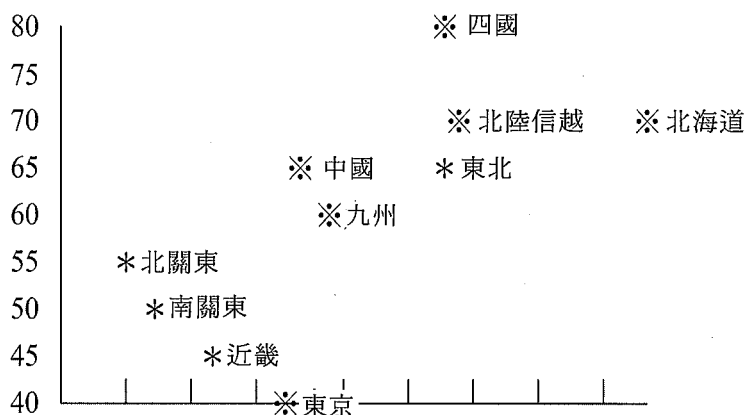
註③〇 蔡增家，「從協合作到衝突脆弱：論日本垂直整合政經模式的轉變」，*問題與研究*，第39卷第2期（民國89年2月），頁39~41。

有二十二億日圓，中曾根派約在十一億至十三億日圓之間，河本派最高也有十五億日圓，根據統計，在所有政治資金收入當中，有高達 44 % 是來自政治獻金。<sup>①</sup>

在另一方面，根據日本學者土居丈朗的研究日本公共投資的地域分配與政黨得票率之間的關係，他發現每個人平均所分配到公共投資金額越大，則政黨在該地區所得到的票就越多，例如四國與北海道在一九九三至一九九五年期間每人平均所分配金額分別為十九及二十六萬日圓，而執政黨在該地區的得票率也分別高達百分之七十七及七十，而東京都每人平均分配金額為十五萬日圓，執政黨在該地區也只獲得百分之四十的選票。<sup>②</sup>由此可見，地方公共建設投資多寡與選票高低是息息相關（圖四）。

而這些政治與經濟上的因素都會密切影響到日本公共建設的施行，以下便以實證來加以說明。

圖四 地方公共投資與政黨得票



資料來源：土居丈朗，「バブル形成、崩壊期の国債發行」，村山岐夫、奥野正寬編，平成バブルの研究：バブルの発生とその背景構造（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2002年），頁373。

## 二、實例分析

本節將舉出兩個日本地方公共工程建設的例證。首先，以群馬縣安中榛名車站為例，說明日本地方政府為了選票利益所進行的無效率公共工程建設，另外則以去年長野縣知事田中康夫罷免事件來說明，若要改革這種無效率狀況，在地方政治上所遭受到保守勢力抵制的阻力。

群馬縣是日本關東地區的農業縣份，在經濟上有最高的平均擁有汽車比例，因此，從群馬縣可以看出日本在派閥政治運作下地方公共工程的概況。日本新幹線長野線在經過群馬縣群馬山嶺當中設置有安中榛名車站，在這個車站四邊都是山，每天在此站

註① 福岡政行，「手にとうように：政治のことがわかう本」，前掲書，頁103。

註② 土居丈朗，前引文，頁373。



上下車的旅客只有個位數。日本政府為何會在此地設置一座車站？最大原因便是在群馬縣出過三任總理大臣，依次為福田赳夫、中曾根康弘及小淵惠三，群馬縣公共建設費用自然在日本都道府當中名列前茅，而安中榛名車站所在地便是中曾根的故鄉。日本政府雖然極力在安中榛名車站附近建設新市鎮，希望吸引許多東京市的上班族到此定居，但是車站附近並無良好的公共設施，同時距離東京約有兩百公里，在房地產泡沫化的同時，日本政府想以安中榛名車站來發展一個新市鎮之成效便相當有限了，這個車站也成為政府公共設施的浪費。<sup>③</sup>

另一個例證是同為農業縣份的長野縣。在日本民間具有高人氣，同時也是作家出身的長野縣無黨籍知事田中康夫，在兩年就任長野縣知事時便積極對地方無效率的公共建設提出改革，他要求在改革方案尚未在國會中通過之時，暫停兩座水庫的興建，田中此議無疑截斷了許多地方議員的財路，因此在自民黨居多的縣議會中，由羽田孜系的縣政會結合政信會共四十八名議員對田中知事提出不信任案，此案在去年七月通過之後，田中康夫便宣布辭去知事一職，同時投入知事補選以訴諸民意，補選結果田中康夫以過半差距擊敗自民黨所推出的候選人。由此可見，日本人民是亟欲對無效率的公共工程進行改革，但是在以自民黨為主的保守派閥掌控下，想要進行政治改革是相當困難的。<sup>④</sup>

由以上第一個案例我們可以發現在政治派閥的操縱與運作下，日本地方公共工程建設絕大部分是為政治人物鞏固選區的選票，而非基於實際需求與經濟考量，因此造成許多無謂的浪費與閒置，當然也就無助於提昇國內經濟的復甦。在第二個案例當中我們知道日本經濟雖然歷經十三年的不景氣，小泉的構造改革也是要改變日本過去派閥掌控的政經運作型態，但是從田中康夫事件可以看到改革面臨最大的阻力其實是來自於自民黨的派閥，他們聯合地方世家來抵制日本政府的改革，這也是小泉改革至今仍然無法收到成效的最主要原因。以下便從財政問題來分析目前日本實際的經濟困境。

## 伍、從財政政策角度看目前日本經濟困境

日本經濟從一九九〇年第二季開始下滑以來，經濟不況已經持續十三年，至今仍然無起色，從宮澤喜一、橋本龍太郎、小泉純一郎，甚至政黨輪替的細川護熙與村山富市仍然無法讓日本經濟復甦，而日本目前經濟最大的困境便是同時面臨財政赤字與銀行不良債權，只要先解決任何一項都會讓另一項債台高築，這是現今小泉純一郎的構造改革無法產生效用的最主要原因。<sup>⑤</sup>

從前面的歷史分析我們知道，日本財政赤字急遽攀升是一九九〇年代的事情，從一九九二年宮澤喜一政權開始，日本實施一連串的擴大政府公共工程支出來刺激景氣

註③ 有關本段敘述係實地訪談日本群馬縣安中榛名車站，2002年7月16日。

註④ 讀賣新聞，2002年7月2日，版1。

註⑤ 塚崎公義，よくわかる構造改革（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2001年），頁15。



對策，想要借用七〇年代的經驗來復甦日本經濟，總計從一九九二年八月至二〇〇〇年十月為止，日本政府總共實施了十次大規模的經濟對策。<sup>⑤</sup>在宮澤的任內是實施兩次綜合經濟對策，第一次在一九九二年八月，是泡沫經濟之後日本政府第一個經濟對策，政府所投資的金額高達十兆七千億日圓，佔當年GDP的百分之二點一，其中使用在公共投資約八兆六千億日圓；第二次則是在一九九三年四月，在該次日本政府總共投資十三兆兩千億日圓，佔當年GDP的百分之二點五，其中包括十兆六千兩百億日圓的公共投資及依照一千億日圓的社會福利措施。總計從一九九二年至二〇〇〇年期間，日本政府投入金額高達一百三十六兆五千九百三十億日圓，<sup>⑥</sup>但是日本經濟仍然沒有起色，反而讓日益惡化的財政赤字大幅攀升。（請參見表二）

表二 泡沫經濟後日本政府的經濟對策規模（一九九二～二〇〇〇）

| 時 期                 | 名 稱     | 經濟對策規模                    | 主要內容                               |
|---------------------|---------|---------------------------|------------------------------------|
| 1992年8月<br>(宮澤政府)   | 綜合經濟對策  | 10兆7000億日圓<br>(占GDP的2.1%) | 泡沫經濟後第一個經濟對策，公共投資8兆6000億日圓         |
| 1993年4月<br>(宮澤政府)   | 新綜合經濟對策 | 13兆2000億日圓<br>(占2.5% GDP) | 包含社會福祉措施1兆1000億日圓，共計10兆6200億日圓公共投資 |
| 1993年9月<br>(細川政府)   | 緊急經濟對策  | 6兆2230億日圓<br>(占1.1% GDP)  | 共計放寬94項目金融管制規定，以擴大住宅融資為主要對象        |
| 1994年2月<br>(細川政府)   | 綜合經濟對策  | 15兆2500億日圓<br>(占3.5% GDP) | 包含5兆8500億日圓的減稅方案，另外7兆2000億日圓為公共投資  |
| 1995年4月<br>(村山政府)   | 緊急經濟對策  | 7兆日圓<br>(占1.8% GDP)       | 實施放寬金融管制五年計劃，提升國內需求及推動經濟結構的改革      |
| 1995年9月<br>(村山政府)   | 綜合經濟對策  | 14兆2200億日圓<br>(占3.1% GDP) | 公共投資12兆8100億日圓                     |
| 1998年4月<br>(橋本政府)   | 綜合經濟對策  | 16兆7000億日圓                | 公共投資7兆7000億日圓                      |
| 1998年11月<br>(小淵政府)  | 緊急經濟對策  | 24兆3000億日圓                | 公共投資9兆3000億日圓                      |
| 1999年11月<br>(小淵政府)  | 經濟新生對策  | 18兆日圓                     | 公共投資8兆8000億日圓                      |
| 2000年10月<br>(森喜朗政府) | 日本新發展政策 | 11兆日圓                     | 公共投資6兆3000億日圓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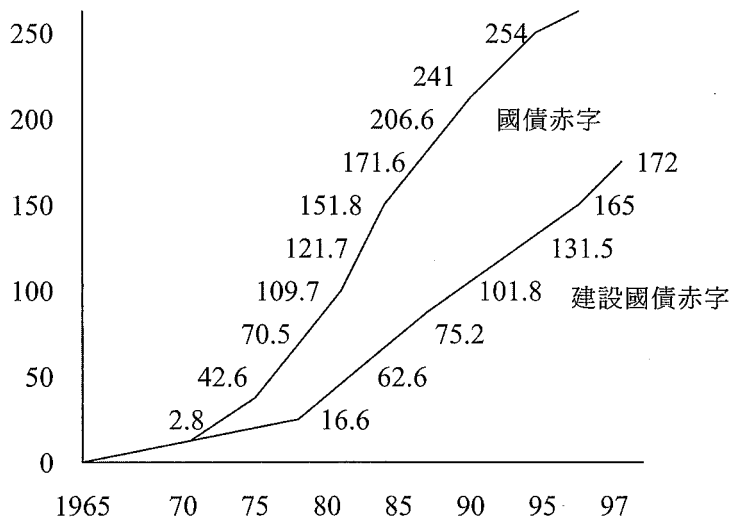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國際經濟情勢週報，第1108期，民國84年11月2日，頁8；富田俊基，日本國債の研究，頁162。

註⑤ 作者根據以下兩項資料加以整理，請參閱國際經濟情勢週報，第1108期（民國84年11月2日），頁8；富田俊基，日本國債の研究（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2001年），頁162。

註⑥ 國際經濟情勢週報，第1108期，頁8。

在總體財政赤字方面，以日本總體國債赤字來看，在一九七〇年總體國債赤字為兩兆八千億日圓，一九七五年國債赤字急遽攀升為四十二兆六千億日圓，在這當中包含建設國債十六兆六千億日圓，到了一九八〇年日本總體國債赤字為一百五十一兆八千億日圓，而當中建設國債六十二兆六千億日圓，一九九〇年之後國債赤字更是急遽上升，以一九九七年為例，總體國債赤字兩百五十四兆日圓，建設國債則有一百七十二兆日圓（圖五）。<sup>③</sup>到去年為止，日本財政赤字已經超過三百兆日圓，是日本一年全國總生產毛額的百分之一百三十。

圖五 日本國債赤字推移



資料來源：小次木潔，財政構造改革，頁15。

在財政赤字高築的情況下，日本政府年度總預算當中，國債支出自然佔相當大的比例，舉例來說，一九九七年政府總體預算支出表當中，國債支出佔百分之二十一點七，高達十六兆八千零二十三億日圓，而在一般歲入支出四十三兆八千零六十七億日圓當中，公共建設經費支出佔百分之十一點一，僅次於社會福利預算支出，高達八兆一千一百六十二億日圓（表三）。<sup>④</sup>而近十年來日本國債的倍增率為五點一倍，以一九九九年為例，日本財政預算當中，國債的依存度高達百分之四十二（表四）。<sup>⑤</sup>由此可見日本財政赤字的嚴重性。

由以上分析，我們發現目前小泉面臨的經濟困境主要是在政治層面，而最重要是來自於政治力量的介入。

因此小泉的解決之道有政治與經濟兩個面向。在政治上必須解決自民黨內的派閥

註③ 小次木潔，前揭書，頁15。

註④ 前揭書，頁43。

註⑤ 富田俊基，日本國債の研究，頁45。



政治及金權政治，在過去歷屆內閣改組當中，自民黨內派閥勢力的平衡是一項重要的考量，當然這次也不例外，只是小泉在此次改組當中將自己的人馬大量進駐在拼經濟的戰鬥位置（財務大臣、金融大臣、經濟財務特任大臣），而將其他派閥的人物安排在比較不重要的職位上（環境大臣、農林水產大臣及防災結構特任大臣），使得表面上看來小泉在這次改組中是兼顧到派閥的平衡，但是實質上在這次改組之後，小泉急欲擺脫黨內派閥的牽制，希望能夠完全掌控整個結構改革步調。<sup>④</sup>

表三 日本政府預算歲出表（一九九七）

（單位：億日圓）

| 項目 | 一般歲出              |                  |                |                 | 國債費               | 地方交付金           | 其他              |
|----|-------------------|------------------|----------------|-----------------|-------------------|-----------------|-----------------|
| 金額 | 438067<br>(56.6%) |                  |                |                 | 168023<br>(21.7%) | 154810<br>(20%) | 18500<br>(1.7%) |
| 細目 | 社會保障              | 公共事業             | 文教科學           | 其他              |                   |                 |                 |
| 金額 | 145510<br>(18.8%) | 86162<br>(11.1%) | 63436<br>(8.1) | 142959<br>(62%) |                   |                 |                 |

資料來源：小次木潔，財政構造改革，頁 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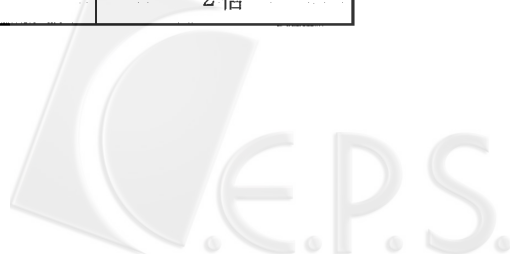
表四 最近十年間日本國債倍增率（一九九〇～一九九九）

（單位：兆日圓）

|       | 1990 年度 | 1999 年度 | 變化率   |
|-------|---------|---------|-------|
|       | 439     | 494     | + 13  |
| 歲出    | 69      | 89      | + 29  |
| 一般歲出  | 39      | 55.7    | + 43  |
| 國債孳息費 | 11      | 10      | - 3   |
| 地方交付稅 | 16      | 13      | - 18  |
| 稅收    | 60      | 47.2    | - 21  |
| 國債    | 7.3     | 37.5    | 5.1 倍 |
| 國債依存度 | 10.6 %  | 42.1 %  | --    |
| 國債餘額  | 166     | 332     | 2 倍   |

資料來源：富田俊基，日本國債の研究，頁 45。

註④ 讀賣新聞，2002 年 10 月 5 日，版 1。



在經濟層面則是要積極進行財政構造改革，小泉上任後，便以復甦國內經濟為其主要的施政目標，但是一年多以來，小泉的經濟成果卻是相有限的，日本經濟在這一年的當中不但銀行不良債權沒有減少，反而因為巨額的財政赤字使得日本經濟又陷入另一波通貨緊縮的漩渦當中。二〇〇三年上半年日本出口貿易雖然連續四個月成長，但是到了年中之後又再度停滯下來，連帶讓小泉的民意支持度降到百分四十。<sup>②</sup>舉例來說，小泉一直想要利用政府公資金來逐步降低銀行不良債權，以提昇國內經濟的成長，但是此舉卻遭到來自加藤派金融大臣柳澤伯夫的反對，這使得小泉不得不擺脫自民黨派閥的抵制全力進行結構改革，從這次內閣改組當中我們可以很清楚發現小泉將經濟復甦的重責全部付託在竹中平藏的身上，因此，在今後小泉必定會信守國際承諾繼續降低國內不良債權的比例，而竹中會是否會使用震盪療法來刺激已經停滯長達十三年的日本經濟，則是大家比較關心的議題。<sup>③</sup>

## 陸、結 論

在一九九一年泡沫經濟破滅之後，日本政府沿用過去的政策，一方面增加政府公共支出來刺激民間投資景氣，造成政府財政赤字進一步的惡化，另一方面不斷調降銀行利率來刺激民間買氣，形成現在零利率的特殊景象，而政府為了籌措公共支出資金的來源，以提高消費稅來替代對企業增稅，結果造成人民普遍不願意消費的通貨緊縮現象。因此，小泉現在所面臨的困境便是政府鉅額財政赤字、銀行體系高額不良債權及通貨緊縮三難的局面。從這次內閣改組小泉撤換加藤派的柳澤伯夫改以其經濟智囊竹中平藏擔任經濟財政大臣兼任金融特任大臣，可明顯看出小泉現今最想解決的便是銀行鉅額不良債權，他想要以政府公資金的注入來逐步打消銀行的呆帳，希望能夠在二〇〇四年能夠完全打平，這是前金融大臣柳澤伯夫所極力反對的政策。小泉欲利用兩年的時間來打消銀行的不良債權，但是處在他面前還有政府鉅額財政赤字及通貨緊縮兩項經濟難題，這些都是需要相當長時間來解決，而並非短期「震盪療法」可以達成的，由此可見，日本經濟想要在短期內復甦似乎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

我國政府現在準備進行五百億擴大政府公共工程計劃來提昇我國經濟，二〇〇三年二月報載，政府這項擴大公共工程振興經濟方案的細目已經出爐，在這項經濟方案當中我們發現兩項特性：執行細目當中，以造橋修路等公共建設為主體，這已經引起地方縣市首長紛紛透過管道來爭取這項建設大餅以作為政績；另外在重點績效方面，政府規定這五百億元預算必須要在年度內執行完畢以利景氣振興。<sup>④</sup>針對以上兩點，吾人不得不提出兩項質疑：首先，以造橋修路等基礎建設為主體已經引起地方政府透過管道向中央政府說項，會不會讓這項預算的分配受到政治力的介入，而產生縣市之

註② 讀賣新聞，2002年7月6日，版2。

註③ 讀賣新聞，2002年10月4日，版1。

註④ 中國時報，民國92年2月10日，版2。



間建設的不平衡；另外，預算必須要在年度內施行完畢，會不會造成地方政府爲了消化預算而產生大量閒置及無效率建設，因而失去政府以擴大公共工程建設來提昇經濟的美意。這是本文關注的焦點。

如何避免一味爲了降低失業率而出現無效率公共工程建設，導致政府財政赤字擴大，重蹈日本面臨財政赤字及銀行不良債權雙重危機的覆轍，將是我國政府必須要謹慎思考的問題。因此，擴大政府公共工程支出是否一定可以提昇經濟，其實端看這些建設費用是否真正用在刀口上，而不至於淪爲地方政治分贓，讓這些建設成爲閒置的圖騰，這是政府在施行這項政策所應該要注意的。

\* \* \*

(收件：92年4月21日，修正：92年9月24日，接受：92年10月1日)





# Globalization and Japan's Recession: Consider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inancial Deficit and Public Construction

*Zheng-jia Tsai*

## Abstrac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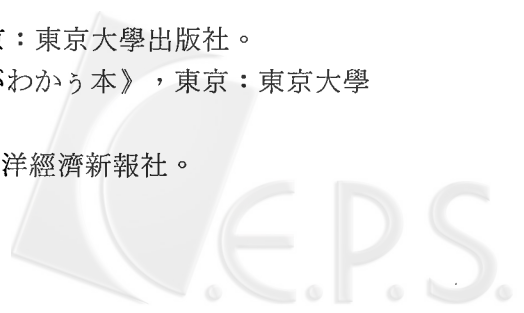
This article analyzes Japan's economic recession in the 1990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financial deficit and local public construction. Common wisdom blamed Japan's economic recession on bank debt default. Yet the Japanese government's deficit increased sharply only recently, which caused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to be trapped in a dilemma between bank debt default and incurring even worse financial deficit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Japan's financial deficit is mainly caused by the inefficiency of public construction at the local level. Since public construction at the local level is the best way for local politicians to woo voters, local public construction in Japan is based on political exchange rather than economic considerations. This article uses Nakano County and Kuma County in Japan as illustrations.

**Keywords:** Financial Deficit; Political Donation; Financial System; Japan



## 參考文獻

- 蔡增家(1999)，「資本管制與金融自由化：以日本為例」，《問題與研究》，38：3，71-92。
- 蔡增家(2000)，「論資本自由化與總體經濟政策的調整：以日本及法國等干預型國家為例」，《美歐季刊》，14：2，229-261。
- 蔡增家(2000)，「垂直-整合與脆弱-衝突：論九〇年代日本金融政治的轉變」，《問題與研究》，39：2，47-48
- 蔡增家(2002)，「九〇年代日本派閥政治之分析」，《問題與研究》，41：3，61-82。
- 蔡增家(2003)，「東亞市場經濟の深化與矛盾」，《問題と研究》(日文版)，32：7，59-71。
- 劉孔中，施俊吉主編(2001)，《管制與革新》，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科所專書(50)，283-327。
- 伊藤正直(2000)，「1990年代の金融システム危機」，伊藤正直、淺井良夫編，《金融危機と革新：歴史から現代へ》，東京：日本經濟評論社。
- 土居丈朗(2002)，「バブル形成、崩壊期の国債發行」，村山岐夫、奥野正寬編，《平成バブルの研究：バブルの発生とその背景構造》，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370-371。
- 岡崎哲二、奥野正寬、植田和男、石井晉、堀宣昭(2002)，《戰後日本の資金分配》，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
- 小次木潔(1998)，《財政構造改革》，東京：岩波書局。
- 富田俊基(2001)，《日本国債の研究》，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
- 眞淵勝(2002)，「財政政策の成功と金融政策の失敗」，村山岐夫、奥野正寬編，《平成バブルの研究：バブルの発生とその背景構造》，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101。
- 秋月謙吾(2002)，「地域金融機關と地方政府」，村山岐夫、奥野正寬編，《平成バブルの研究：バブルの発生とその背景構造》，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182-183。
- 「行政投資實績」，東京：自治省出版，1996年至2000年。
- 辻中豐(1989)，《利益團體》，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
- 小林吉弥(1987)，《越山會》，新瀉：新瀉日報社。
- 燿渡展洋(1991)，《戰後日本の市場と政治》，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
- 福岡政行(2000)，《手にとりように：政治のことがわかる本》，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
- 塚崎公義(2001)，《よくわかる構造改革》，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



Amsden, Alice (1989), *Asia's Next Giant: South Korea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leming, Marcus J.(1963), "Domestic Financial Policies under Fixed and Floating Exchange Rates," *IMF Staff Paper*, 9, 369-379.

Johnson, Chalmers (1982),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 1925-1975*,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Vogel, Steven (1996), *Freer Market, More Rules: Regulatory Reform in Advanced Industrial Countri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Wade, Robert (1990), *Governing the Market: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 Industrialization*,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Yoshikawa, Hiroshi (2001), *Japan's Lost Decade*, Tokyo: International House of Japan.

